

辛亥革命史稿

第四卷 ● 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胡绳武 金冲及 ●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胡绳武
金冲及
著

辛亥革命史稿

第四卷
● 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唐克敏

封面装帧 邹纪华

辛亥革命史稿

第四卷 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胡绳武 金冲及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本书在上海发行所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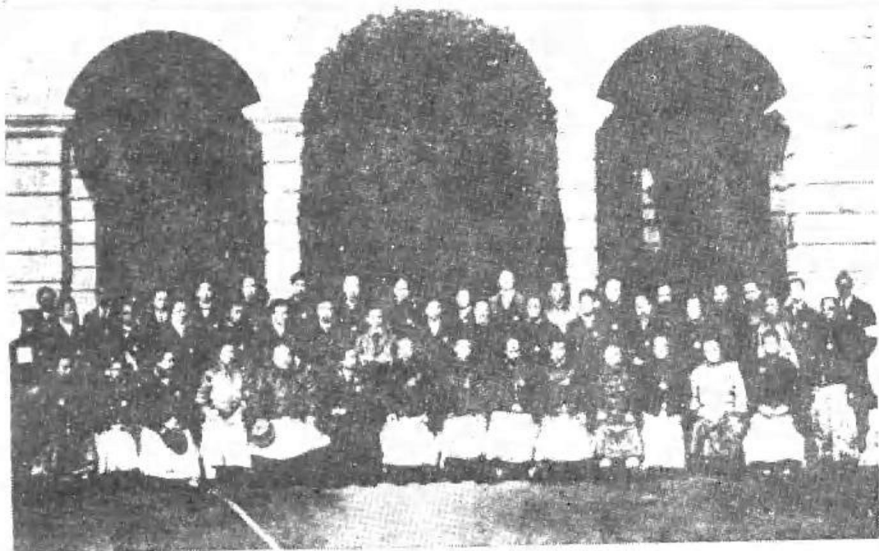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1.5 插页 7 字数 496,000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208-01183-4/K·272

定价: 11.90元



1911年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会议在南京举行，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图为与会代表合影

1912年1月5日，孙中山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右起：黄钟英、蔡耀月、蔡元培、陈锦涛、孙中山、黄兴、王宠惠、王鸿猷





1912年1月28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成立时合影。前排右第三人起：胡汉民、魏宸组、赵士北、孙中山、黄兴、蔡元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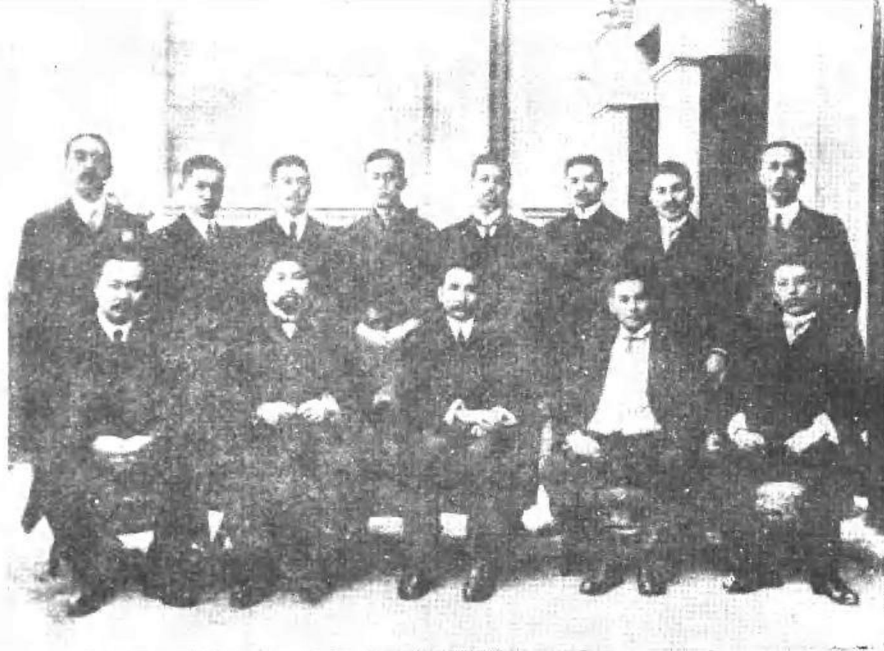
革命军在街头帮助群众剪辫子



1912年3月6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宋教仁被刺后遗像





1913年3月，孙中山和黄兴等人在上海商议讨袁问题时合影

孫中山宣言

當南北統一之際，僕推薦袁世凱於參議院，原望其開誠布公，盡忠民國，以慰四萬萬人之望。自是以來，僕於權利所在，則為引避，危疑之交，則為襄助。雖激昂之士，對於袁氏時有責言，僕之初衷，未嘗少易。不意宋案發生，袁氏陰謀一旦盡揭，僕於當時已將反對袁氏之心，宣布天下，使袁氏果知公義自在，輿論難誣。爾時即應辭職，以謝國民。何圖袁氏專為私謀，倒行不己，以致東南人民荷戈而逐，旬日之內，相連並發，大勢如此，國家安危，人民生死，皆繫於袁氏一人之去留。為公僕者，不以國利民福為懷，反欲犧牲國家與人民，以爭一己之位置。中華民國豈容開此先例？願全體國民一致主張，令袁氏辭職，以息戰禍，庶可以挽國危而慰民望，無任懇企之至。

1913年7月，孙中山发表宣言呼吁全国人民统一意志，“令袁氏辞职，以息战祸”

目 录

(一) “革命时代之政府”

- 一、孙中山的归国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1
- 二、临时政府的立法建制和除旧布新 21
- 三、各政治团体雨后春笋般地兴起 57
- 四、振兴实业的热潮 88
- 五、社会风尚的演变 107

(二) 在困境中为巩固共和而奋斗

- 六、严重的财政困难 137
- 七、北伐、议和、清帝退位与袁世凯窃权 157
- 八、定都之争 180
- 九、参议院风波 207
- 十、唐绍仪内阁的组成与临时政府的北迁 221

(三) 民初政争

- 十一、三种政治力量 243
- 十二、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与共和党的成立 258
- 十三、南京留守府的建置与撤销 279
- 十四、唐内阁的垮台与同盟会的政党内阁主张 295
- 十五、陆征祥组阁风潮 327

十六、孙、黄应邀北上与张、方事件的发生	339
十七、孙、黄北上与调和“南北冲突”	368
十八、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	385
十九、梁启超的归国	398
二十、沙俄侵华引起的轩然大波	414
二十一、“军民分治”之争与江西民政长事件	434

(四) 国会选举与二次革命

二十二、国会组织法与国会议员的选举	465
二十三、环绕着召开国会与制定宪法的斗争	490
二十四、宋教仁案的发生	507
二十五、反对善后借款风潮	533
二十六、国会的召开与进步党的成立	553
二十七、袁世凯加紧备战与二次革命发动的迟缓	574
二十八、二次革命及其结局	611
二十九、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667
后记	679

（一）“革命时代之政府”

一、孙中山的归国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一次重大飞跃。它标志着在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和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诞生。这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十多年来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结出的硕果。不管历史浪潮在以后还经历多少起伏和曲折，但它毕竟已无法倒流。中国人民正是在先行者打开的这条通路上，不断向前迈进的。

建立南京临时政府，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是经过两个多月复杂激烈斗争才得以实现的。

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普遍响应，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已有十四省宣布独立。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迫切地要求建立统一的中央革命政府，来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同盟会，事前虽没有忽视政权这个极为重大的问题，也企图把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可是它却对武装起义成功后将会出现的复杂形势估计不足，缺乏有力的组织上的准备。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集团和立宪派及其政治势力乘机崛起，觊觎政权，形势极为复杂。面对这样的局面，缺乏强有

力的领导核心,内部又十分涣散,而且部分人员地域和权势思想严重的同盟会,已不能发挥统一的领导作用。1911年11月初在开始筹组中央临时革命政权的过程中,很快就出现了上海和武昌两个对立的集团。它们先在中央政府的地点后在临时大总统的归属问题上,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斗争,致使临时中央政府迟迟不能成立。摆在革命党人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要推举一位革命资历足以服众、在全国素有崇高威望、才识胆略胜于同辈的领袖出来膺选。孙中山是全国人民公认的革命领袖,他虽没有直接参予武昌起义的领导,但是起义的人们仍然把他当作革命的领袖,用他的名义来号召群众组织群众。武昌起义后不久发刊的《中华民国公报》,就在10月31日“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的名义向各省同胞发出布告,号召“各省义军代表,同心戮力,率众前驱”,“建立共和国”^①,就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因此,当12月中旬“南北和谈”已经开始,而临时中央政府产生困难的时刻,人们就把目光投到孙中山的身上。就在这时孙中山从海外归来,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使得南京临时政府得以正式成立。

武昌起义的当天,孙中山正在美国从西海岸乘火车前往中部、东部各地向华侨募捐的旅途中。10月11日他抵达哥罗拉多(Colorado)州的典华(Denver,今译丹佛)城。由于旅途疲倦,他睡到第二天11时才起床到食堂用膳。道经回廊报摊时,买了一份报纸到餐厅阅看,才得知武昌已被革命党占领这一意外消息。但是,他并没有立即起程回国,而是“决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为什么这样?因为他认为今后革命的成效如何,列强的态度关系至大。他说:“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

① 原件藏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

系者有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政府未定者也。是以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倘使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①

对帝国主义怀着一种恐惧的心理，害怕中国革命因帝国主义的干涉而遭受太平天国那样的失败，是当时革命党人的共同弱点。这一点，孙中山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这种心理在革命党人中之所以普遍存在，一是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干涉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不能不加以考虑，二是由于他们自身的软弱，找不到抵抗帝国主义干涉的足够力量。从当时的客观形势看，孙中山本来应该立刻回国亲自领导正在迅速开展中的这场极为复杂的斗争，使它向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但是，他的主观认识却限制了他的行动。

孙中山把外交重点放在英国，同时也努力争取其他列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10月中旬，孙中山在美国中部城市芝加哥参加了当地同盟会举行的预祝中华民国成立的大会后，就和同盟会会员朱卓文（孙中山的表弟，原侨居芝加哥）乘车前往华盛顿，并在18日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 Knox），要求秘密会晤，希望能获得美国对中国革命的道义支持与物质援助，尤其是坚守中立。但他没有取得诺克斯的接见。10月26日，孙中山到纽约又会见了秘密来访的日本驻纽约总领事水野幸吉的代表鹤冈永太郎，表示愿以公开的身份访问日本。并说，为此他曾致电宫崎寅藏，探询日本政府的意向。24日接到萱野的复电：如果他肯改名，登陆或停留都可以。孙中山表示：如果日本

^① 《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页209、210。

政府能同意他不更改姓名而登陆,对中国革命示以同情的态度,他愿意改变原定的到欧洲后经印度洋返国的计划,再度取道美国,经西雅图前往日本。他认为,这样既可以鼓舞革命军的士气,又可消除外界认为日本国政府暗中庇护北京政府的疑虑,对双方都有利。这表明他正极力争取日本政府不干涉中国的革命。

孙中山在华盛顿和纽约的外交活动,并没有取得实际的结果。当时美国的一些报纸对他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采取了敌视的态度。“如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纽约时报社论即以为:孙的募捐工作不会成功。翌日,这一报纸又有社论认定:只有袁世凯是唯一能将和平与秩序给予中国的人。”^①

11月2日,孙中山只得离开纽约赴伦敦。行前,他在10月31日发给已在伦敦的美国友人咸马里的电报中,表示对回国领导革命有坚强的信心。他说:黎元洪“突然成功可能助长其野心,但他缺乏将才,无法持久。各地组织情况甚好,都希望我加以领导。如得财力支持,我绝对能控制局势”^②。初到伦敦后与英国记者谈话时也说:“倘国人召彼前往组织中央政府,以总理一席属之,彼必乐为效力。”^③再一次表示了他对政权的重视。可是,当他在康德黎家中接到上海有成立政府的消息后,却突然向康德黎夫妇表示:“余于共和国大统领毫不介意。”^④接着,在16日又发电报给《民立报》说:“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拥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

① 吴相湘编撰:《孙逸仙先生传》,页981。

②③ 《孙中山全集》,第1卷,页544、559。

④ 同上书,页559。

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文临行叩发。”^①为什么在短短几天内，孙中山对掌握政权问题的态度会起这样大的变化？看来，这同孙中山到伦敦后英国政府向他公开表示英国将支持袁世凯做大总统有密切关系。

孙中山到英国进行外交活动的目的，除想取得英国对中国革命的谅解、向英国争取贷款以便回国供革命之需外，还想阻止四国银行团贷款给清朝政府，以免清廷得到贷款后继续对革命进行顽抗。

清朝政府原来与四国银行团签订过川汉铁路一亿元、币制改革一亿元的贷款合同。当时这两宗借款，一宗已发行债票，收款存备待付；一宗已签约而尚未发行债票。武昌起义后，清廷急于想把这两笔贷款弄到手中。可是，由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为迫使清廷将政权交给袁世凯，要求伦敦拒绝贷款给清廷，所以孙中山还在大西洋旅途中时，四国银行团已在巴黎作出暂时不同清廷谈判、须待新的正式政府成立后才能再谈借款的决议。^②四国银行团的这一决议，表面上看是同孙中山的要求相一致的，实际上却是适应英国支持袁世凯窃取权力这一方针的。

在孙中山到达英国前，咸马里已在伦敦替他进行过多方面的活动，寻找支持人。当时英国马克沁机枪(Maxim)厂的厂主达耳生(Sir Trevor Dawson of Vickers, Sons, and Maxim)看到孙中山将来有可能当选为大总统，盼他订购武器与军火，愿意从中代孙同英国政府联系。据孙中山后来的回忆，他“到英国时，由美人同志咸马里代约四国银行团主任会谈磋商停止清廷借款之事。……乃银行主任答以惟外务大臣之命是听，不能自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页547。按孙中山是11月11日到达伦敦，20日离开伦敦的。电报底本注明11月16日发自巴黎。此电发出时孙中山尚在伦敦。此电或拍发地点有误，或托人在巴黎代发。

②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页417。

由作主也，云云。予于是乃委托维加炮厂总理（按即为马克沁机枪厂厂主达耳生）为予代表，往与外务大臣磋商，向英政府要求三事：一、止绝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国。三事皆得英政府允许。予乃再与银行团主任开商革命政府借款之事，该主任曰：‘我政府既允君之请而停止吾人借款清廷，则此后银行团借款与中国，只有与新政府交涉耳。然必君回中国成立正式政府之后乃能开议也。’”^① 根据近人的研究，孙中山上述这段回忆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具体情况是：达耳生代表孙中山于“十一月十四日会见英内阁外相格雷(Sir Edward Grey)除送一份由孙与咸马里签署的文件，希望成立一盎格鲁撒克逊联盟以联合英、美。孙先生希望经由美国务卿诺克斯及参议员卢特(Root)等取得密切联系，请格雷电询华盛顿。孙在这一文件中申言：如英国同意，可自美国借得一百万镑。孙并力言需要英国的友谊与支持援助。孙允诺给予英美在中国的若干优先权利，但格雷并没有接受孙的要求。英国外务部官员甚至称呼孙是‘理论性的与喜说大言的政治家’(an armchair Politician and Windbay)”^②。这里说“格雷并没有接受孙的要求”，显然是指孙中山在文件中所提的“成立一盎格鲁撒克逊联盟以联合英美”，“如英国同意可自美国借得一百万镑”的要求。至于孙中山所提出的前面所说的三项要求，格雷口头上答应是可能的。因为孙中山所提出“止绝清廷一切借款”这一项，四国银行团已做出了暂不与清廷谈判贷款的决议；“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一条，也是符合当时英国反对日本直接干涉中国革命这一既定方针的；至

①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页210、211。

② 吴相湘编撰：《孙逸仙先生传》，页984。

于取消各处英属政府对孙中山的放逐令这一条,孙中山在11月24日自法国乘轮返国的旅途中,也收到了英国政府不反对他在返国途中经过英属殖民地以及香港等地得作短暂的停留的通知。所以,孙中山在追述此事时说:他所要求的“三事皆得英政府允许”。而孙中山在追述中没有提到但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达耳生代表孙中山同格雷“磋商”时,格雷不仅没有接受孙中山的要求,反而根据英国政府支持袁世凯代替清朝政府作为它在中国的新代理人的方针,“告知达耳生转告孙:‘英国将保持中立’。并言,中国似有一立于革命党反对方面的良好的人即袁世凯,英国人将尊敬袁。所有外国人以及反满的团体都可能给予袁世凯以总统的职位——假如他能够驱逐满清并赞成共和”^①。孙中山是把对英国外交的成败,看成是“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②。英国外相既然公开向他声明支持袁世凯做大总统,自然是他不能不认真考虑的问题。弄清了这种背景后,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孙中山到英国后短短几天内对掌握政权的问题的态度会起那样明显的变化。

诚然,孙中山自己没有明白表示过他对这一重大问题态度的改变是由于受到英国政府公开支持袁世凯做大总统的压力和影响。但是,我们从孙中山归国前在伦敦的这段经历来看,格雷的公开干涉中国内政的声明,无疑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当然,孙中山归国前就打电报回国,表示可以赞成让黎元洪或袁世凯来做“民国总统”,是受到英国政府公开向他声明支持袁世凯做总统的压力。但这表明他对清朝的汉族大官僚存在着幻想,对革命党要搞革命建设必须掌握政权这一根本问题缺乏

①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下册,页984。

②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页245。

足够的认识。孙中山认识上的这种弱点，是与他把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斗争，停留在反满和政权形式的更易上，没有把汉族的官僚、军阀、豪绅当成革命的对象，甚至还有害地把他们当作可以争取的同盟者，分不开的。既然孙中山在归国之前就公开表示过黎元洪、袁世凯都可以作为“民国总统的人选”，那末，这就不难理解，当他回国后为客观形势所迫的时候，就会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了。

孙中山在伦敦进行外交活动后，在11月21日由伦敦到达巴黎，24日由马赛乘船归国。他在巴黎一共住了三天，进行繁忙而紧张的外交活动。法国外交部当时的一份文件说，孙中山同一些政界人士及同东方汇理银行的经理进行了交谈。他本人后来回忆道：“过巴黎，曾往见其朝野之士，皆极表同情于我，而尤以现任首相格利门梳（今译克列孟梭，按：孙中山这里所说的‘现任首相’，是就他1918年回忆往事时说的，不是就其1911年会见时说的。当时克列孟梭只是在野的参议院议员、外交委员及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最为恳挚。”^①根据近人的研究，孙中山当时在法国会见的政界人物，除自己所说的克列孟梭之外，还曾由当时法国《世纪报》的记者阿尔贝·梅崩（Albert Maybon）和阿尔贝·米约（Albert Milhand）陪同到法国众议院，会见过众议院议员阿尔弗雷得·马赛（Alfred Masse）、吕西安·于贝尔（Lucien Hubert）及博雷尔（Borel）等人，并向他们提出法国是否愿意承认中华民国的问题。除政界人物外，孙中山还会见过巴黎《巴黎星期报》和《巴黎日报》等报的记者，以中国革命的指导者的身份，就即将提上日程的建国任务及对外关系的某些原则做出说明，争取外国的同情与支持。

象在英国一样，孙中山到法国活动的重点是放在借款方面

^① 《孙中山选集》，页211。